

E0BOOK.COM 游书网
www.ecbook.com

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 刘松来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陈子昂 阮惠 阮惠 阮惠 阮惠

I 两 援 II 刘 援 III 经学—关系—古典文学—研究—中国—
—两汉时代 IV 援 援 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援 援 号

书 名: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张岱年

本书作者:刘松来

丛书策划:朱光甫

责任编辑:朱光甫

封面设计:梅家强

版式设计:吴晓晓

责任印制: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援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印刷厂

开本: 援 援 印张: 援 援 字数: 援 援

版次: 援 援 年 援 月 第 援 版 第 援 次 印刷 印数: 援 援

定价: 元 陈子昂 阮惠 阮惠 阮惠 阮惠

邮政编码 援 援 援

电话: 援 援 援 援 援

网 址: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传真: 援 援 援 援 援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导 论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员）
——经、经学与两汉文学
- 一 “经”与经书文本的文学价值……………（圆）
- 二 两汉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苑）
- 三 经学夹缝中生长的两汉文学……………（员）
-

上 编 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

- 第一章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员）
——关于《周易》的文学解读
- 一 《周易》卦、爻辞中的原始歌谣风貌……………（圆）
- 二 《易传》文学思想管窥……………（苑）
-

- 第二章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猿）
——关于《尚书》的文学解读
- 一 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散文雏形……………（源）
- 二 几种文学表现手法的初步尝试……………（源）
- 三 中国古代散文体式的滥觞……………（缘）
-

第三章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	(缘)
	——关于《诗经》的文学解读	
一	《诗经》情感类型及其文化内蕴	(缘)
二	意念展示与《诗经》的情感表达	(苑)
三	《诗经》情景关系的文化解读	(愿)

第四章	“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	(怨)
	——关于《左传》的文学解读	
一	“惩恶劝善”与儒家的文学主张	(怨)
二	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	(苑)
三	《左传》描写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	(园)

第五章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园)
	——关于《礼记》的文学解读	
一	“乐”的概念及其艺术本质论	(园)
二	“温柔敦厚”与儒家的“中和之美”	(苑)
三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儒家的文质论	(愿)
四	“惟君子为能知乐”与儒家的艺术鉴赏论	(源)

中 编 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

第一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员)
	——汉初文化学术的整合与再生	
一	黄老之学兴盛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员)

-
- 二 汉初诸儒对黄老思想的吸纳与整合 (员 劫)
三 黄老告退与儒学复兴 (员 缘)
-

- 第二章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员 怨)
——儒学独尊与今古文经学的文化透视
- 一 儒学独尊与文化专制的形成 (员 园)
二 今文经学的传承与特点 (员 源)
三 古文经学的传承与特点 (员 怨)
四 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融合及其文化学术意义 ..(员 园)
-

- 第三章 “叛散五经 ,灭弃风雅 ” (员 缘)
——经学式微与学术文化复归多元
- 一 经学的讖纬化及其批判 (员 园)
二 “党锢之祸 ”与经学的衰落 (员 园)
三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与学术复归多元 (员 苑)
-

下 编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

- 第一章 “发乎情 ,止乎礼义 ” (员 苑)
——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
- 一 《诗经》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员 园)
二 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话语体系 (猿 园)
三 经学语境之外的文学理论之声 (猿 怨)
-

- 第二章 “约符命以经术 ,贯天人于治教 ” ..(猿 源)
——汉代政论散文的经术化及其背离

-
- 一 汉初政论散文的特点及其经术化走向 (猿猿)
 - 二 武帝至元、成之世散文经术化的完成 (猿猿)
 - 三 东汉后期政论散文对经术化的背离 (猿猿)
-

第三章 “诗人之赋丽以则 辞人之赋丽以淫” (猿猿) ——汉代赋体文学流变与经学的关系

- 一 骚体赋问世与汉初政治学术的内在因缘 (猿猿)
 - 二 汉大赋的话语方式与经学语境之关联 (猿猿)
 - 三 经学衰微与赋的文体升华 (猿猿)
-

第四章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 (猿猿) ——史传文学勃兴、演变与经学的关系

- 一 《史记》史学成就与文学要素的现代解读 (猿猿)
 - 二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接纳与超越 (猿猿)
 - 三 《汉书》问世与史传文学向经学全面归附 (猿猿)
-

第五章 “岂惟观乐 于焉识礼” (猿猿) ——汉代诗体文学与经学的关系

- 一 礼乐复兴与“乐府”机构的重建 (猿猿)
 - 二 经学语境中的汉乐府创作 (猿猿)
 - 三 汉代经学与文人四言诗 (猿猿)
 - 四 两汉经学终结与文人五言诗崛起 (猿猿)
-

余 论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 (猿猿) ——两汉经学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缘 缘)
后 记	(缘 缘)

内容提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两汉经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学术专著。全书包括上编、中编、下编三大部分。其中上编五个专题,主要从文学视野解读《五经》文本,以此说明经学与文学存在着先天性的内在因缘;中编三个专题,主要从学术的视野观照两汉经学,既对两汉经学的发生演变历史展开历时性的描述,又对其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展开共时性的阐释,力图向读者昭示两汉经学独特的学术品格;下编五个专题作为全书的核心内容,主要以文体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地描述了两汉经学与文学的互动轨迹,力证在两汉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学曾经产生过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尝试从文化视野观照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努力揭示出经学语境中文学独特的话语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导 论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

——经、经学与两汉文学

翻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人们几乎可以处处感受到“经学”的气息。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找不到第二门学科像经学那样长久而深远地左右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大致从汉代开始，学校教育和统治阶级举行的科举取士，几乎无一例外均以经学为首要标准和基本内容。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学业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从文化学术的层面来看，经学与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考据学等传统学科均存在密切的关系。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在皮锡瑞《经学历史·序》中曾经指出：“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这一见解无疑是十分精当的。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崇圣尊经”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封建文人从小便开

始阅读经书，到死方休。所谓“皓首穷经”，正是千百万封建文人人生的真实写照。翻检史书，人们可以随处见到古人对读书的最高赞誉不外乎“饱读《诗》《书》”，或是“博览群经”；而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则是“出入经史”、“遍注群经”。在当时的社会中，读书人被称作“经生”，学者也就是“经学家”，著述文章更是离不开引经据典，经书真正成了中国封建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经和经学既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而两汉又是经学形成发展和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无论是从文化学术或是文学艺术的观点来看，两汉经学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许正是看到了经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关联，所以刘勰才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断言：“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所谓“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更是精当地揭示出了早期文学与经和经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当然，经与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也决非像刘勰眼中所看到的那样，到处是一片光明。相反，在很多方面，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都弊大于利。然而，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文化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对它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所以笔者认为选择两汉经学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经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一 “经”与经书文本的文学价值

要探讨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首先必须努力廓清两个重要概念，这就是“经”和“经学”。

关于“经”的解释,自古历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流行最广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将“经”释为“常”;“五经”即“五常”;另一种解释则以为“经”不过是书籍的代名词。

释“经”为“常”的观点始见于班固所撰的《白虎通·五经》: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在班固看来,所谓“经”,就是指人们必须遵循的永恒不变的常道;儒家的五部著作之所以被称为《五经》,正是因为它们分别表述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永远值得尊奉的伦常之道。鉴于“五经”和“五常”之类的术语先秦时期尚未流行,不难看出,“五经”即“五常”的说法明显出自汉代学者的比附。尽管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经”字有时也可训为“常”,但大多情况下并不针对儒家的经书而言。此外,先秦时期各家学说的权威书籍也多有称经之例,如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医家有《医经》。甚至到了汉代,屈原的《离骚》也可称为《离骚经》。这些称经之例与“经”训为“常”的说法往往相牾。

由于认识到了训“经”为“常”之说的上述破绽,所以章太炎系统地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认为:

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经”只不过是一切书籍的通称。这种说法同样存在与战国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合之处。据现存史料记载,

战国时代的学者指称书籍一般不用“经”字，而是用“典籍”、“书契”之类的词语，例如《孟子》中提到“宗庙之典籍”，《系辞传》提到“圣人易之以书契”等等，这些都可以得出与章太炎观点相反的结论，即“经”字不能泛指一切书籍，而只能指称各家学说中一些特别重要的书籍。

客观地说，以上两种释“经”之说虽有偏颇，但合理之处居多也是不容置疑的。从语义学的观点来看，班固主要看到了“经”字的引申义，而章太炎则主要着眼于“经”字的本义。或许正是看到了以上两种说法存在着内在的合理之处，所以清代著名经学家提出了“经”为孔子垂教后世所作的教科书的见解：

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

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①

皮锡瑞的见解既考虑到了“经”的本义与书籍有关，又兼及“经”的引申义具有儒家纲常含义的特指性，因而更令人信服。顺着这一思路，当代学者周予同先生很自然地得出了如下结论：“‘经’的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基本上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②

与“经”相关联的是“经学”。“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兒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 四九一—四九二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 23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宽传》。

兒宽 ,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 ,从郡国选诣博士 ,受业孔安国……见上 ,语经学。上说之 ,从问《尚书》一篇 ,擢为中大夫 ,迁左内史。

从《汉书》的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 ,至迟在汉武帝时代 ,经学已经正式形成。就经学的外在形式而言 ,它不外乎一种解经、用经、传经的活动和现象 ,这就是周予同先生所说的“所谓‘经学’ ,一般说来 ,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①从思想实质来看 ,经学活动则往往渗透着经学主体的观念和理想 ,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学派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由此可见“经”与“经学”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前者赖后者而昌明 ,后者据前者而阐发 ;如果把“经”和“经学”比作一棵大树 ,那么“经”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茎和躯干 ,而“经学”则是大树的枝叶。

与“经”相关联 ,还存在一个经书文本的问题。熟悉经学史的人都清楚 ,经书文本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有一定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数量的不断增多。从西汉最初的《五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公羊传》)到宋代最终形成《十三经》(在西汉《五经》的基础上 ,增设《周礼》、《礼记》、《左传》、《驩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 ,经书文本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 ,内容也更加驳杂。在这十三种完全定型的经书文本中 ,与汉代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 ,主要有《诗经》、《尚书》、《周易》、《公羊传》和《仪礼》等经书文本 ;与古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经

^①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 246 页。

书文本则是《诗经》、《尚书》、《周易》、《周礼》和《左传》；而作为儒学杂编性质的《礼记》一书，一直到郑玄作注之后，才逐渐成为较为重要的经书文本。至于《论语》和《孝经》，汉代虽有今古文之别，但并未引起争端。如此看来，我们对两汉经学的研究，着眼点可以主要落在与今古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经书文本之内。

由于文史哲杂糅乃是中国古代早期学术的共同特征，所以作为原始儒学思想载体的《五经》文本具有文学价值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指出：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砮，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諲以邃矣。

刘勰所言，可以视为最早对《五经》文本文学价值作出的系统总结。其后，对经书文本文学价值的零星评鹭更是俯拾即是：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

(韩愈《进学解》)

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刘师培《论文杂记》)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古今学者已经认识到经书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要素,而且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随着文学史研究日渐深入,对单个经书文本的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丰硕成果,但对整个经书系统文学价值的挖掘毕竟尚在草创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在探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过程中,先对经书文本进行一番文学解读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指出的是,经学和文学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此两汉经学的研究与经书文本的文学解读所倚重的材料是同中有异的。在笔者看来,在《十三经》的文本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当首推《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和《礼记》,于是进入本书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也就仅限于以上五种。

二 两汉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学术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在人类发展史上形成的一切专门系统的学问,诸如哲学、史学、语言学以及各类自然科学,均可称之为学术。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而言。就中华学术来说,依照传统的说法,则大致上可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由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是《六经》,所以“经学”也就成了中华学术的源头。在中华学术的三大块中,义理之学主要源于汉代的今文经学,考据之学则源于汉代的古文经学,至

于词章之学虽然不直接脱胎于经学,但同样以“宗经”为本,仍在经学的樊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学术确实与经学结有不解之缘。中华学术既然与经学结有不解之缘,而经学又奠基于两汉,于是两汉经学在中华学术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概而言之,两汉经学在学术史上的这种特殊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汉经学完成了儒学经典化的过程。

作为儒家学说基本载体的《六经》(实际上是《五经》),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定型,但由于在那个时代儒学尚未获得学术上的至尊,所以在人们的心中,《六经》充其量只不过是几种较重要的文化典籍罢了。庄子所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庄子·天运》),正是当时人们心态的一种如实反映。进入汉代之后,出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儒学开始逐渐被奉为至尊;伴随着儒学走向至尊的过程,作为儒学载体的《六经》也就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典籍,摇身一变成了神圣不可冒犯的经典。翻开汉代的历史,儒学经典化的进程昭然若揭。

汉初陆贾在《新语》中开始把《五经》抬到与“天道”相匹的高度:“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①在这里,《五经》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真可谓“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新语·本行》)。

与此相类似,匡衡也认为:

^① 《新语·道基》第 4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年版。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汉书·匡衡传》）

东汉末年的荀爽更是断言：“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后汉书·荀爽传》）

通过统治者和儒生的共同倡导和推动，儒学终于在汉代完成了质的飞跃，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普通一员走向了至尊的“祭坛”。从此《六经》也就成了神圣不可冒犯的政治、道德和学术的经典。儒学经典化的完成一方面锁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品格，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儒学的生机开始被扼杀。

第二，两汉经学确立了“天人感应”这一中华学术的基本思维模式。

“天人感应”作为极富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虽然早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庄子等人的学说中已初具雏形，孟子就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是上天赋予的，人只要尽心知性便能知天，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也主张消除一切差别，天人混一，但真正把这种思想演变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却无疑是汉代经学。

汉初的《淮南子》一书中，就开始出现了“天人感应”的论述：

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泰族训》）